

真相与谎言之间：《法国中尉的女人》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研究

邓文婷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2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10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20日

摘要

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构建了双层叙事结构：框架叙事由限制性全知叙述者讲述查尔斯与萨拉的情感纠葛，嵌入叙事则由萨拉亲口讲述她与法国中尉的往事。萨拉的嵌入叙事在价值判断与核心事实两个维度上均呈现出显著的不可靠性，其语体风格的内在矛盾构成这一不可靠性的叙事标记。文章借助布思的不可靠叙事理论与费伦的三轴分析框架，考察这一不可靠叙事的生成机制及其修辞功能。研究发现，萨拉的不可靠叙事是一套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她以表演性的受难叙事姿态引导查尔斯的情感与行为，最终为自己争取到逃离的可能。这一策略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话语规约下以叙事谋求主体能动性的困境，也体现了福尔斯借叙事分层与多重结局解构单一价值判断的后现代叙事意图。

关键词

约翰·罗伯特·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叙事分层，不可靠叙事，萨拉

Between Truth and Lies: A Stud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in the Embedded Narrativ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Wenting D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July 12, 2026; accepted: August 10, 2026; published: August 20, 2026

Abstract

John Fowles'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constructs a two-ti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matrix

文章引用：邓文婷. 真相与谎言之间：《法国中尉的女人》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研究[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4): 517-524. DOI: 10.12677/wls.2026.144073

narrative, delivered by a selectively omniscient narrator, traces the emotional entanglement between Charles and Sarah, while the embedded narrative consists of Sarah's own account of her past involvement with the French Lieutenant. Sarah's embedded narrative exhibits marked unreliability along two axes—the axis of value judgment and the axis of narrative fact—and the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in her rhetorical register serve as the textual markers through which this unreliability is signaled. Drawing on Wayne Booth's theory of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James Phelan's three-axis framework,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nerative mechanisms of Sarah's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its rhetorical functions across different levels of reader response.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Sarah's unreliable narration constitutes a deliberate narrative strategy: by performing the posture of a suffering woman, she shapes Charles's emotions and conduct, ultimately securing the conditions for her own escape. This strategy illuminates the predicament of Victorian women, who were compelled to negotiate narrative agency within a system of discursive constraints, and reflects Fowles's postmodern intent to resist singular moral judgment through narrative layering and multiple endings.

Keywords

John Robert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Narrative Layer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Sarah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是英国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其代表作《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以多重叙事视角与开放式结局颠覆了传统小说框架,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经典。作品的核心主题,福尔斯在致中文译本的序言中已明言:“我的小说主题就是写在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位地位卑贱的女子是如何获得自由的”([1], p. 3)。小说主人公萨拉如何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秩序中争取自身主体性,正是这一主题的核心所在,也因此成为学界研究的持续焦点。

国内学界对小说中萨拉形象的研究存在明显分歧。多数学者认为萨拉具有不确定性与混杂性,是具有存在主义精神的主体形象:曾燕冰从原型批评角度分析了萨拉身上的多重原型([2], p. 101);陈静结合维多利亚时代语境得出相近结论([3], pp. 114-116);肖锦龙从解阉理论出发,揭示了萨拉在阶级身份、女性身份、宗教道德身份、精神情感身份层面从遵守社会规则到破坏规则中逐渐建立主体性的动态过程,但将萨拉对查尔斯的引诱和离弃视为浪漫主义情感作祟([4], pp. 5-9)。牟仁莉对此持相反意见,认为萨拉声音的缺失使其处于客体位置,她仅仅作为引导查尔斯回归心灵、实现自我价值的辅助者,不能称为“新女性”([5], p. 30)——这一判断忽视了小说第二十章萨拉主动讲述自己与法国中尉故事这一关键叙事行为,以及她选择自身命运的行为。张格格虽注意到萨拉具有叙述者权力[6],但未深入分析其嵌入叙事在叙事技巧层面的运作机制。

英语世界的相关批评较早注意到萨拉形象与叙事形式、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并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持续的分歧。塔博克斯(Katherine Tarbox)指出,萨拉在第二十章的“表演”(charade)本质上是为查尔斯设置的一场“godgame”,其叙述与其说是自我袒露,不如说是引导对方挣脱维多利亚束缚的精心布置[7]。萨拉米(Mahmoud Salami)从后现代叙事诗学出发,强调福尔斯通过戏仿维多利亚现实主义惯例又从内部加以颠覆,使萨拉的叙述成为质疑叙事权威本身的元叙事装置[8]。另一批带有女性主义立场的研

究者则对小说的“女性主义”提出质疑：迈克尔(Magali Cornier Michael)在《萨拉是谁？》一文中指出，萨拉的内心始终被排除在文本之外，读者对她的全部认知都经由查尔斯、叙述者乃至福尔斯本人的男性视角中介，因而她并未真正成为叙事主体，而更像一个功能性的情节装置([9], pp. 225-236)；库珀(Pamela Cooper)进一步认为福尔斯将创造力预设为男性特权，女性仅被容许以缪斯或客体的身份进入其中[10]；伍德科克(Bruce Woodcock)则从男性气质研究的角度，揭示福尔斯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男性想象与焦虑的投射[11]。

综观中外研究可见，围绕萨拉究竟是自主的叙事主体还是被男性视角所建构的客体，学界始终存在张力。英语世界的批评多在“福尔斯是否真正赋予萨拉主体性”这一价值层面展开论争，却较少从叙事技法层面追问：萨拉的这种“主体性”或“被建构性”究竟通过何种具体的叙事运作得以生成。本文无意在既有论争中简单择一站队，而是尝试与上述研究展开对话，将关注点从人物形象的价值评判转向嵌入叙事的技法运作：借助修辞叙事理论与不可靠叙事理论，梳理小说的叙事分层，分析嵌入叙事中不可靠性的生成标记及其修辞功能，从而为理解萨拉形象的复杂性与福尔斯的叙事意图提供一个侧重叙事形式的视角。这一侧重也有助于说明，为何萨拉既可能被读作自主的主体，又可能被读作被建构的客体——这种阐释分歧本身，恰是其不可靠叙事在不同读者层面所激发的不同效果。

2. 叙事分层与萨拉的叙述者身份

当一个故事包含在另外一个故事之中时，叙事就产生了不同的层次，出现了叙事分层。引发另一叙事层的故事称为框架叙事(Matrix Narrative)，被引发的故事称为嵌入叙事(Hyponarrative) ([12], pp. 23-29)。《法国中尉的女人》具有这两个叙事层，叙事的分层出现于第二十章。其基本讲述场景是：午后，在韦尔康芒斯山朝南的一个僻静的小山谷上，萨拉“侧身坐到山楂树前数英尺处的小圆丘上，面对着大海”，向一个本不应该吐露真心的绅士——查尔斯——讲述自己和法国中尉瓦盖纳的往事。很明显，《法国中尉的女人》有两个“故事内层次”(Intradiegetic Level)：第一层是框架叙事，聚焦查尔斯如何被萨拉吸引并与之秘密会面；第二层是嵌入叙事，由萨拉亲口讲述她与瓦盖纳相识、相爱乃至被抛弃的经过。尽管嵌入叙事篇幅小，叙述者又是处于社会边缘的萨拉，但它却是推动框架叙事情节转折的核心枢纽，也是刻画萨拉神秘形象的关键所在，而这恰是学界长期忽视之处。

詹姆斯·费伦将叙事定义为“某人在某场合下为某种目的给某听众讲述某个故事”[13]，这意味着叙事层次不仅是文本现象，更是叙述者实现修辞意图的策略。据此，我们需要追问各层讲述者的叙事意图及叙事效果：嵌入层中，萨拉为何选择在此时此地向查尔斯讲述这段故事？她的讲述方式折射出何种叙事意图？她是否达成了目的？进而，福尔斯为何设计这一双层叙事结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对嵌入叙事内部不可靠性的细读。

3. 萨拉的嵌入叙事及其不可靠性

3.1. 理论界定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提出，叙述者可靠与否取决于其言行是否符合隐含作者的规范：凡叙述者的陈述或价值判断与隐含作者的伦理、信念、艺术标准存在偏差者，即构成不可靠叙事[14]。此处隐含作者指读者从整部小说综合感知到的价值立场，有别于叙述者本身，它是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技巧、文体、语气等各种成分所体现出来的作品在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标准的集合。

韦恩·布斯将不可靠叙事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事实不可靠叙事，另一类则是价值判断不可靠叙事。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此基础上将不可靠叙事从两个类型或两个轴(“事实/事件轴”和“价值/判断轴”)发展为三个类型或三大轴(即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并指出三轴之间可能形成对照、对立或因

果关系[14]。这一框架使读者得以解码叙事中的真假虚实，并由此把握叙述者的心理特征，对揭示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15], pp. 133-143)。萨拉的嵌入叙事主要在事实轴与价值轴两个维度上呈现出不可靠性，且二者之间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事实轴上的虚构——“失身”故事的捏造——正是支撑价值轴上受难叙事姿态的叙事基础，而这一不可靠性本身，也是福尔斯塑造萨拉复杂主体形象的核心叙事手段。

3.2. 不可靠的叙事标记及其修辞功能

萨拉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首先显影于两处可被读者直接观察到的叙事标记，而这两处标记同时已经预示了其修辞功能的走向。

其一，嵌入叙事内部的语体风格矛盾。萨拉的讲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她与法国中尉瓦盖纳的故事——瓦盖纳与她相恋后始乱终弃，返回法国与原订婚女子完婚，萨拉由此背负“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污名，被莱姆湾上流社会视为道德堕落的弃妇；另一部分是对自身处境与内心痛苦的表露——因接受了超越本阶层的教育，她被迫悬置于两个阶级之间，陷入婚姻无望的孤立处境。作为家庭教师，她每日近距离感受着阶级壁垒造成的生存落差，以及维多利亚时代苛严的道德规范对女性的系统性约束。两部分语调截然不同。在讲述与瓦盖纳的故事时，她支支吾吾、兜着圈子，“断断续续，吞吞吐吐地说完一句话后，都有一个奇怪的小停顿”，刻意等待查尔斯主动追问，逼他自己去探索真相，从而达到自己的叙事目的。当查尔斯问及瓦盖纳是否要求她嫁给他时，“她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把话说出来”，随后又数次补充，“她又做了补充”……“她用比较平静的口气又补充了一句‘我恐怕没有把自己的意思解释得很清楚’”([1], pp. 86-89)，始终保持被动姿态。然而，一旦转入表述自身痛苦，她却妙语连珠、坦率直接、毫无迟疑。这种语调的断裂暗示：关于瓦盖纳的故事并非全然属实。值得注意的是，嵌入叙事中的不可靠性并非静态的，而是一个渐变过程——由不可靠逐渐向可靠靠拢，虚构的是她与法国中尉的经过，真实的是她最终袒露的本心。这一由“遮蔽”向“袒露”滑动的语调设计本身即具修辞意图：它诱导受述者在追问中不断向讲述者靠近。

其二，框架叙事与嵌入叙事之间的人物形象落差。框架叙事中，限制性全知叙述者着力刻画萨拉的机智与能言善辩：她能通过波尔坦尼太太的苛刻面试，帮助女仆米利保住工作，化解费尔利太太的刁难。在去往秘密目的地时，萨拉一直处于引领查尔斯的主导地位，“她步履轻盈稳健，一只手把裙子提起几英寸，另一只手捏着她那顶黑帽子的缎带。查尔斯跟在她后面，行动远不如她敏捷”——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的规范要求完全相悖，正如查尔斯心里所想的“爬山时女子本来应该在后面，不应该跑到他前面去”。然而，叙述者对萨拉的定调并不止于此：在嵌入叙事开始之前，她将查尔斯安排坐在燧石座上，自己则侧身坐于数英尺外的小圆丘上，以便他能看到她的半边脸，叙述者随即评注：“这可能又是她巧妙地卖弄风情的一种手段”——这句话已为后续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预先定了调。果然，进入嵌入叙事后，原本果断独立的萨拉却对查尔斯“羞怯地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做了个手势”，与框架叙事中的形象判若两人。这一反差在客栈态度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在嵌入叙事中对法国中尉所住客栈深表厌恶——“我从未涉足过这样的客栈。在那里，人们全然不顾行为的不得体，他们崇拜罪恶就像人们在高尚的场所崇尚道德一样”([1], pp. 85-89)，而此后她却主动选择位于埃克塞特“红灯区”的恩迪克特家庭旅馆栖身，并运用自己的美学观念装饰房间，将这段独居时光视为“成年以后头一回度假的乐趣”([1], p. 142)。前后态度的悖离，进一步坐实了嵌入叙事中人物形象的表演性质。

这种表演性并非第二十章的孤例，而是贯穿萨拉全部行动的持续特征。其中最具策略性的是她对“讯息”的经营：她刻意让查尔斯得知自己的行踪，又以近乎沉默的方式将选择权抛回给对方，使查尔斯在“追寻”的错觉中一步步走入她所铺设的路径。萨拉对何时言说、何时沉默、向谁透露何种信息的精确把握，表明她的不可靠叙事是一种持续的人格与生存方式，而非一次性的谎言。

3.3. 价值轴上的不可靠

萨拉嵌入叙事的不可靠主要表现在价值轴与事实轴两个维度上。要分析价值轴上的不可靠,需先厘清嵌入叙事的隐含作者形象。布思界定,隐含作者是读者从文本中建构的作者形象,体现文本的道德视角与价值取向,有别于叙述者本身([14], pp. 71-73)。值得强调的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这类后现代文本中,隐含作者并非一个稳定、单一的价值权威。福尔斯设置了一位不断闯入文本、公开申明“这个故事完全出于想象”、“我不知道”的元叙事叙述者,他甚至声称笔下人物拥有不受作者支配的自由。这种自我拆解使隐含作者的规范本身处于被悬置和被质疑的状态。因此,本文所谓“隐含作者的价值立场”,并非一个可供简单援引的道德标尺,而是读者在通读全书、权衡各种相互抵牾的声音之后,为解释文本而建构的一种阐释性假设。

据此假设,在本章末尾,萨拉对自身处境的表达最为直接可信,由此可推断隐含作者的价值倾向。在这一段里,萨拉发出了全书中最振聋发聩的声音:“是的,就让他们把这个字眼说出来吧。让他们知道我过去受苦,现在仍在受苦,和大地上每个城镇每个村庄里的其他人一样受苦”。这番话并非单纯的个人宣泄,而是对维多利亚时代阶级结构的主动揭示——萨拉拒绝将自身苦难私人化,而是将其指认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症候,由此显露出清醒的阶级意识与反抗意志。随后,她说到“有时候我几乎可怜她们。我认为自己享有一种她们无法理解的自由。什么侮辱,什么责任,都触动不了我”([1], p. 89)。这句话标志着萨拉完成了从受害者到主体的自我确认:她不再以社会规范为参照来衡量自身的缺失,而是将被主流秩序视为污点的边缘处境转化为一种自由的来源。这也正是隐含作者的价值倾向:对阶级秩序与道德规范保持清醒的批判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突破束缚的主体能动性。

然而,萨拉作为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却与此相悖——她将与法国中尉的往事描述为自己的“耻辱”与“罪”,对瓦盖纳极尽负面评价:“有点像蜥蜴,能随着周围的环境改变自己的颜色”、“毫无顾忌、反复无常、情欲强烈而又十分自私”([1], p. 88)。叙述者以受难者自居,将主动选择包装为无辜受害——这与隐含作者层面所显现的独立主体性之间,构成鲜明的价值轴偏差。

3.4. 事实轴上的不可靠

事实轴上的不可靠通过后续情节得到最终证实。第四十六章,萨拉与查尔斯发生关系后,查尔斯发现萨拉仍是处女,她与法国中尉“失身”的故事纯属虚构。这意味着嵌入叙事的核心事实陈述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谎言。这一不可靠性在阅读过程中极难察觉。除萨拉高超的叙事策略外,叙事分层本身也遮蔽了读者的怀疑:福尔斯让框架叙事中一个戴着神秘面纱的人物担当嵌入叙事的叙述者,读者往往不自觉地接受了萨拉叙述的权威,很少怀疑其讲述。这种叙事陷阱的揭示依赖于对叙事进程的整体把握[16]:只有读到第四十六章,读者才得以回望第二十章的隐秘谎言,并在震惊中重新理解萨拉的全部行为。

4. 引导、逃离与反讽:不可靠叙事的修辞功能

萨拉的不可靠叙事并非无意识的失误,而是服务于多重修辞目的的有意策略。其效果可从对查尔斯的直接引导与对整体叙事的反讽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在对查尔斯的引导层面,萨拉以断断续续的方式讲述她与法国中尉的故事,使查尔斯在主动追问中逐渐投入,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她通过表演性的犹豫与痛苦制造情感共鸣,引发他的怜悯与保护欲。全知叙述者在此三次描写了“远志花”这一意象:“她从身边的陡坡上折下一小枝远志,蓝色的花朵像可爱天使的小生殖器”、“她开始摘远志小枝上的叶子”、“她把远志小枝放在一边,手指紧紧抓住大腿”([1], pp. 86-87)。在西方文学与民俗传统中,远志花素有“对往事的忠实追忆”与“友谊的忠贞”之意,同时又因常用于葬礼花环而被称为“死亡之花”,其拉丁词源“pervinca”更意为“缠绕与束缚”。

福尔斯在此同时调用并颠覆了这一传统：萨拉正在讲述的是关于“往事”的故事，却是虚构的往事；这段讲述表面上是坦白，实则是“缠绕”——叙述者以“可爱天使的小生殖器”这一出人意料的比喻将圣洁之花情色化，正是这一反讽结构在意象层面的直接显现。这一系列描写为整次谈话蒙上了情色气息，将查尔斯潜藏的情欲推向意识表层，他最终也意识到自己“对萨拉起了淫心的心理阴暗面”。萨拉由此在情感与欲望两个维度上同时吸引了查尔斯，在本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赢得了主动权。

詹姆斯·费伦在《疏远型不可靠性、拉近型不可靠性与〈洛丽塔〉的伦理》一文中，将不可靠叙事区分为“疏远型不可靠性”(Estranging Unreliability)与“拉近型不可靠性”(Bonding Unreliability) ([17], pp. 222-238)。前者指不可靠叙事凸显或拉大了隐含读者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后者则指虽然隐含读者发现了叙述者的不可靠性，但这一不可靠性所携带的某些信息为双方共同认同，二者在情感、伦理上的距离反而被拉近。在萨拉的嵌入叙事中，查尔斯同时充当了受述者与隐含读者的双重角色——他既是她开口讲述的直接对象，也是她在构建整个叙事时心中预设的目标接受者。萨拉对这位“隐含读者”有着精确的判断：查尔斯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却对上流社会繁文缛节深感厌倦，内心对真实情感与突破社会常规抱有隐秘的向往。萨拉的嵌入叙事正是以这一共同立场为支点：她讲述的是一个人如何跨越阶层界限追随真实的情感冲动，并为此甘愿承担社会代价——这套叙事逻辑与查尔斯内心对浪漫主义情感的渴望、对贵族婚姻虚伪一面的不满高度契合。即便查尔斯察觉到萨拉叙述中的某些矛盾与夸饰，这些被双方共同认可的情感与价值立场仍将源源不断地拉向萨拉的叙事轨道，使他最终无法以旁观者的姿态抽身。

然而，若引入隐含读者与现实读者的区分，这一“引导”的效果便呈现出更具层次的动态样貌。查尔斯作为受述者所代表的，是萨拉叙事所预设，并极力拉近的隐含读者，他体验到的是一种“拉近型不可靠性”；而掌握了框架叙述者预先提示(如“卖弄风情”的评注)，并将在第四十六章获知真相的现实读者，则处在另一重位置上，更容易体验到一种“疏远型不可靠性”。因此，同一段嵌入叙事在不同层次的读者中激发出方向相反的反应：查尔斯越是被拉入萨拉的情感轨道，现实读者越是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正是这种读者层面的分裂，使萨拉的叙事引导呈现出动态而非单向的样貌——它对故事内的受述者奏效，却在故事外为现实读者预留了反思的空间。在查尔斯眼中，她的故事“美得不真实”，几乎带有乌托邦色彩——而这，正是萨拉预设并精心营造的叙事效果。

萨拉对查尔斯施加的影响，还通过两个叙事层之间的类比关系进一步深化。雅恩(Jahn)指出，不同叙事层次的故事内容可能具有类比关系。萨拉讲述的是一段跨越阶层的情感冲动、一种对社会规范的主动逾越，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代价——而这在结构上恰好映照了查尔斯自身的处境：他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门当户对，符合一切维多利亚时代的体面标准，却缺乏真实的情感共鸣，不过是阶级秩序与社会期待合谋的产物。萨拉的故事与查尔斯的现实之间由此形成隐性对照：一个人选择跟随欲望、承担代价，另一个人正困陷在体面的规约里无从抽身。萨拉无需明言，这段讲述本身便已向查尔斯提出了一个无声的问题：他是否有勇气承认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萨拉真正的目的正在于此——借助这一叩问诱使查尔斯介入她的处境，成为帮助她逃离莱姆湾的那个人；在后续情节中她刻意暴露行踪，将自己置于困境，引导他主动为她安排出走。查尔斯后来的抉择证明，这一叙事策略完全奏效了。

当读者随着叙事进程最终发现萨拉仍是处女、她的“失身”故事纯属虚构时，整段嵌入叙事便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布思指出，当叙述者的不可靠性被读者察觉时，往往产生反讽效果[14]。萨拉的嵌入叙事所携带的反讽具有双重指向。其一，指向萨拉自身处境的悲剧性：她不得不将自身的主体选择包装为被动遭遇，以受难叙事姿态迎合查尔斯的道德期待，才得以换来他的介入与帮助。她的自由，是以对自身经历的扭曲叙述为代价换来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秩序里，一个女性要获得自由，所能动用的资本竟只有谎言，这本身正是结构性约束最深刻的体现。其二，反讽同样指向查尔斯所代表的维多利

亚时代知识分子男性群体。查尔斯自诩理性、道德，是那个时代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然而他却在一个女人讲述“失身”故事的过程中完全缴械——他以为自己出于怜悯，实际上他的反应暴露了他对维多利亚道德规范的深度内化，以及他对女性弱势叙事的迷恋。正是这套道德体系塑造了他对“失足女性”的想象，使他不自觉地将萨拉的表演性受难视为真实，将自己的情欲包裹在怜悯与拯救的道德外衣之下。查尔斯在自以为道德清醒的状态下，恰恰成为萨拉叙事策略最深的回应者——他的“受触动”，正是维多利亚时代性别秩序与道德话语双重标准最深刻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萨拉叙事的不可靠性并不随情节推进而被“澄清”，反而被小说的多重结局进一步放大。福尔斯在第四十四章先行虚设了一个查尔斯回归欧内斯蒂娜的传统结局，旋即由闯入叙事的叙述者将其否定；在结尾处，他又并置了两个互不相容的结局：一个是查尔斯与萨拉借由孩子拉丽姬重归于好，另一个是萨拉断然拒绝、留查尔斯独自离去。叙述者甚至以掷硬币的姿态拒绝在二者之间作出裁断。这种结构性的悬置使萨拉的动机与身份始终无法被最终锁定：读者既无法确证她的“受难”，也无法确证她的“自由”。多重结局由此与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形成呼应——二者共同将“萨拉究竟是谁”这一问题永久地敞开，将价值判断的权力交还给读者。

对福尔斯而言，双层叙事结构是实现多重叙事意图的工具。嵌入叙事的不可靠性模糊了虚构与现实、真相与谎言的边界，使小说拒绝单一的价值判断，保持叙事的开放性；框架叙事与嵌入叙事的类比关系，则将“获得自由”这一主题从抽象命题落实为具体的叙事行动，呈现了女性在维多利亚时代以迂回策略求生存的复杂图景。萨拉不仅是小说主题的承载者，更是叙事策略的实践者——她的故事本身，即是福尔斯对叙述权力、性别秩序与女性主体性三者关系的深刻探问。

5. 结语

通过对《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叙事分层与嵌入叙事不可靠性的分析可以发现：萨拉并非既有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或是被动的叙事客体，或仅是推动查尔斯实现自我价值的辅助者，而是一个主动运用叙事策略的叙述主体。她在价值判断和事实陈述两个维度上的不可靠叙事，构成了一套精密的修辞机制：以表演性的犹豫与痛苦引发查尔斯的情感投入，以双方共同认可的价值立场激活他对突破社会规范的隐秘渴望，以类比性的叙事逻辑引导他成为帮助自己逃离的那个人。这一双重运作——既引导了查尔斯，又为自己的出走铺路——与其说是对道德的背叛，不如说是对结构性约束的主体性回应。

然而，这一回应并非没有代价。萨拉的自由是以对自身经历的扭曲叙述换来的，她不得不将主动选择伪装为被动受难，才得以在一个剥夺女性话语权的秩序中争取到有限的叙事空间。由此，布思意义上的反讽具有双重指向：既揭示了萨拉处境的悲剧性，也反照出查尔斯所代表的维多利亚时代知识分子男性以怜悯之名介入、实则深陷其自以为已审视过的道德体系的困境。

福尔斯将这一叙事设计嵌入双层叙事框架并辅以多重结局，使萨拉的不可靠叙事既成为推动情节的戏剧性装置，又成为质疑叙述本身权威性的元叙事姿态：谁在讲述、谁被讲述、谁的讲述得以被相信——这些问题在双层叙事的张力中被持续悬置，使小说拒绝任何单一的价值判断。《法国中尉的女人》因此不仅是一部关于自由的小说，更是一部关于女性如何以叙事本身作为策略、在话语秩序的缝隙中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的小说。萨拉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在一个系统性压抑女性声音的时代，唯有借助谎言，某种真相才得以抵达。

参考文献

- [1] 约翰·福尔斯. 法国中尉的女人[M]. 陈安全,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
- [2] 曾燕冰. 原型解读下的后现代文本——《法国中尉的女人》女主人公形象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06(10): 99-102.

- [3] 陈静. 从维多利亚时代看《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女主人公形象[J]. 甘肃社会科学, 2009(1): 113-116.
- [4] 肖锦龙. 结阕和解阕——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身份建构[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2): 4-12.
- [5] 牟仁莉. 《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的隐蔽性[J]. 北方文学(下半月), 2011(4): 29-30.
- [6] 张格格.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主体间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银川: 北方民族大学, 2022.
- [7] Tarbox, K. (1988) *The Art of John Fowle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 [8] Salami, M. (1992) *John Fowles's Fiction and 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 [9] Michael, M.C. (1987) "Who Is Sarah?": A Critique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s* Feminism.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28, 225-236. <https://doi.org/10.1080/00111619.1987.9936460>
- [10] Cooper, P. (1991) *The Fictions of John Fowles: Power, Creativity, Femininity*.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https://doi.org/10.1353/book6601>
- [11] Woodcock, B. (1984) *Male Mythologies: John Fowles and Masculinity*. Harvester Press.
- [12] 唐伟胜. 叙事层次: 概念及其延伸[J]. 外国语文, 2015, 31(1): 23-29.
- [13] Phelan, J. (2005) *Living to Tell about It: 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4] Booth, W.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15] 申丹. 何为“不可靠叙述”? [J]. 外国文学评论, 2006(4): 133-143.
- [16] Phelan, J. (1996) *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7] Phelan, J. (2007) Estranging Unreliability, Bonding Unreli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Lolita*. *Narrative*, 15, 222-238. <https://doi.org/10.1353/nar.2007.0012>